

# 周恩来改稿的创新性解析

张同刚

“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绿”字的敲定，是改稿艺术的佳话。周恩来经历与改稿相关的工作有：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编辑《敬业》，兼任《布尔塞维克》编委；创办《少年》、《曙光》、《军事通讯》；领导创办重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领导创办英文刊物《新华周刊》；指导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的业务。这些工作，让他修改了大量的稿件，无论是“名编辑”还是“草根编辑”，只要与他修改过的稿件“邂逅”，都会一见钟情。编辑们学习、传承周恩来的改稿艺术，在这个信息充斥视听、传媒竞争激烈的时代，在许多编辑把“苗”锄掉留下“草”的时代，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今时代是以创新为特征的时代。创新，就是继承前人，又不因循守旧；借鉴别人，又有所独创。周恩来改稿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把自己的观点、思考与智慧大量地注入别人的文章；二是源于原稿，高于原稿，在原稿的基础上，打上“周氏烙印”，或者使之更深化、更完善，点石成金，锦上添花；三是书面语和口语完美结合，取长补短，效果神奇，引人入胜。

周恩来修改稿件的创新性首先表现在经常把自己的观点、思考与智慧大量地注入别人的文章。他的思想、警言妙语让别人的稿件增光添彩、高飞远举。发现标题不足而加以修改，往往可以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1952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两周年，社论原题为《坚决保卫和平，争取朝鲜战争的胜利结束》，周恩来将其修改为《坚决保卫和平，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奋斗到底！》。如果我们了解社论写作的时代背景，便可悟出这一修改的妙处所在。“争取”是力求获得、力求实现的意思，语气比较平缓，留有很大的余地，而“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奋斗到底！”则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且语气掷地有声，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力量，是周恩来思考的结果。

1964年举国欢庆建国15周年时，在北

京隆重上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周恩来倾注了自己心血浇灌出来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这部有3000多人参加演出的史诗，融歌、舞、诗于一体，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壮大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受到国内外的普遍赞誉。关于大歌舞的名称问题，此前上海搞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个题目太长，有人建议用“东方红”。周恩来立即表示赞同，认为这个题目很好，既精练又切题。

1970年5月5日《人民日报》二版一篇新闻的标题是《周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观看“红色娘子军”》，周恩来看后说，这样不妥，应标为《西哈努克亲王在周总理陪同下观看“红色娘子军”》，并指示：“明天报纸，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成立的声明，要放在上边，我国承认的声明放下边，先是他们，后是我们。”6月18日见报的《周恩来总理会见阮氏萍》一稿，原稿写的是“接见”，周总理在审稿时说，“接见”这个词太封建，还是改用“会见”好。这样做，不仅尊重团结了国际友人，而且也为广大新闻受众所认可。从那以后，我们国内的新闻媒体对类似的报道，均将“接见”外宾改为“会见”外宾，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当今纸质媒体的新闻标题，由于受到网络的冲击，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包装”术，有一些“包装”是精当的，但有不少是不得体的、变味的。我们看到的标题，许多不是为了“点睛”，而是为了制造“噱头”，导语也不是什么“凤头”，而是一顶花哨的“帽子”。标题越玄乎的，正文可能越没有什么看头；导语越煽情的，后面可能一点情趣都没有了。新闻不是不可“包装”，但“包装”必须做到装而不空、装而不俗、装而不浅、装而不伪。学习周恩来对于标题的修改，会帮助编辑们制作出吸引众多粉丝的标题来。

周恩来改稿反映他对事物发展的本质认识，是其最新思想的体现。对别人文稿的修改，处处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睿智。1970年3月4日，周恩来在审改新

华社关于防治吸虫病会议的新闻时，将“发扬共产主义的协作精神”改为“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和社会主义的协作精神”。当时许多同志还不能理解周恩来这一改动的深刻含意。1971年6月6日，周恩来陪同外宾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时，看到一张照片说明中又有“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的提法，当即指出：这种提法不好，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应该提社会主义大协作，讲共产主义风格可以，共产主义什么样子我们都还没有经过嘛！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谁也没见过，理想和现实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还要五六十年时间，如果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算起还要上百年的时间。从这一修改可以看出周恩来修改文稿的思想是多么具有前瞻性。

1964年6月，周恩来陪同朝鲜的崔庸健委员长到哈尔滨访问。在迎宾文艺晚会上，曲作者王双印演唱了自己最新创作的歌曲《革命靠的是毛主席思想》。演出结束后，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他说：“这首歌写得好，曲调明快，歌词形象生动。若把‘毛主席思想’改为‘毛泽东思想’就更为准确了，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集体的智慧嘛！”为准备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国务院的王维澄、人民出版社的齐速、商务印书馆的汝晓钟、人民出版社的张惠卿组成起草小组起草《汇报提纲》。向周恩来汇报到“要出好毛主席著作、马恩列斯著作”时，周恩来马上纠正说“马恩列斯著作要放在前面”，当时，他们的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接着汇报到“要突出毛泽东思想”和“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地方时，周恩来又立即指示“要提全，前面加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强调说：“水有源，树有根，毛泽东思想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根，不能割断根嘛！”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科

学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内涵,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并非属于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而是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1972年6月26日,人民画报社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5周年,拟在这一年第8期上刊登《沿着毛主席的建军路线胜利前进》一文。周恩来在审阅该文时批示:“有了投降主义,就不要再加右倾机会主义的形容词。”从周恩来1964年、1971年和1972年的三次改稿,可以看出周恩来改稿有深刻的思想内涵。

1972年7月,周恩来出于安全原因,劝说西哈努克亲王不要到西非去访问。他要亚非司以周恩来本人的名义写一说帖。亚非司起草的电报,叙述因由较详,用词有些程式化。因情况紧急,周恩来等不及请亚非司的同志到西花厅去修改,只能自己动手。说帖简明扼要,总共不过三五百字,其中让外交官李樵记忆最深的一句是:“柬埔寨全国七百万人民的命运,系阁下于一身,望阁下此次暂缓前往西非访问……”周恩来紧急改说帖,不仅表现出周恩来对西哈努克亲王关怀备至,更说明了他在外事问题上的洞察秋毫。

周恩来还是驾驭标点符号艺术的高手,经常修改他人文章的标点符号,从不把它作为小事而忽略。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伪装和平,于1945年8月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谈判。8月28日,毛泽东一行飞抵重庆。由于国民党对谈判没有诚意,事前毫无准备,谈判过程中的一切提案均是由中共方面提出的,国民党代表恼羞成怒,有人传给周恩来一张纸条,上写“对牛弹琴”。说不过,竟耍流氓!周恩来不动声色,只是在纸条上的“对”字后边加上了句号,在“牛弹琴”后边加上叹号,就成了:“对。牛弹琴!”国民党代表看到后十分尴尬和狼狈。周恩来巧妙地应用小小标点,竟成就了令敌人胆寒的故事,流传经久。

源于原稿,高于原稿,在原稿的基础上,打上“周氏烙印”,点石成金,锦上添花,是周恩来修改稿件创新性的第二个特点。字斟句酌,高屋建瓴,是周恩来修改文

稿的常用方法。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指示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了《一九五二年国庆节》,让中国人从电影里看看中国,了解中国。谁知电影放映后,有美国记者说:“这部电影说明中国在搞军国主义。”周恩来并不生气,他让再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工作人员为这部片子准备了长达十六页的说明书。周恩来要求只在请柬上写一句: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西方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会是啥样?简短的标题式的说明书吊足了胃口,结果不出周恩



1960年5月,周恩来(左二)访问柬埔寨时和西哈努克亲王等在一起。

来所料,观众看得如痴如醉,反映很好。周恩来写的说明在原影片“原汁原味”的基础上浓缩精华,没有“注水”,说明虽短,但内涵厚重,这是周恩来对中外文化都很了解的结果。

1965年2月14日,周恩来修改吴冷西、乔冠华起草的《联合国往哪里去?——评戴高乐二月四日的讲话》一文。文中说:“不久以前,我国周恩来总理提出,联合国必须改正错误,彻底改组,也可以另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周恩来加写:“还有亚非一些国家的首脑或政府,也认为联合国犯的错误太多,必须加以改组。”修改后,论据更充分了,联合国改组不仅仅是中国一国的要求,而是许多国家的要求。

鬼城丰都,中外扬名,它以前的名字叫酆都。1958年周恩来查勘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来到丰都,县委负责同志汇报酆都县粮食生产由1949年的1亿公斤上升到1957年的2亿多公斤时,周恩来满意地点头,看

到酆都的“酆”字难写难认,他说:“现在酆都县年年丰收,就把‘酆’字改成丰收的‘丰’字嘛!”遵照周恩来的意见,经酆都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上报四川省人民政府转国务院,于当年9月22日批准,正式改名为丰都县。改名后,丰都的“丰”字既好记好认通俗易懂又寓意丰收,真可谓一字立骨、片言居要。

标语,一般文字简洁精练。周恩来却能发常人所未发,修改后的标语更加具有宣传鼓动作用。1959年1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参观广东从化县溪流小学,看到墙上有张标语“人人要讲普通话”。他点头赞好,但建议改为“人人学讲普通话”。一字之改,区别很大。“要讲”带有强迫性,非讲不可。但南方不同于北方,小孩子不同于成年人,硬性规定要讲,反而不切实际。改为“学讲”则大不相同,孩子们可以先学后讲,老师也有责任教学生怎样讲,这正是学校的任务。

周恩来用词力求科学、准确、恰当。他在熟悉的老同志面前,常称邓颖超为“小超”;在他比年轻的熟人跟前,有时也遵从他们对邓颖超亲昵的称呼,称之为“邓大姐”。但他从来不用“太太”或当年盛行的“爱人”,更不袭用旧社会读书人谦称“拙荆”、“贱内”、“糟糠”这一类现在一般青年人不知为何物的称谓。那么,在外宾面前,周恩来又怎样称呼邓颖超呢?1956年9月间,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求见周恩来,代表政府正式邀请周恩来总理和夫人访南。周感谢邀请,说他本人很愿意去;至于“我妻子访南的事情,我还要同她商量”。又说,他不久将出访印度,印度大使夫人花了很多时间“劝我妻子去印度”,但没有劝成。周恩来进一步解释说,“我妻子身体不太好”,出访有困难。周恩来在这次谈话中,为什么称印度驻华大使的妻子为“夫人”而三次称邓颖超为“我的妻子”呢?因为洋人分不清“爱人”(Lover)与“情人”(sweet heart)有何区别,且“爱人”未必为夫妻;“夫人”(madam)则是对第三者的专称;只有“妻子”(wife)的含义最清楚,不会引起误解。他与南驻华大使的谈话,不称“我的夫人”而称“我的妻子”,使用上之规范与明确,用词严谨而准确是毋庸置疑的。1961年下半年,他看

到一则报道他归国的消息上有“周恩来同志神采奕奕地走下飞机”时，找到那位写报道的记者说：“现在我们国家正经受着很大的困难，全国人民都在受苦，我周恩来凭什么还‘神采奕奕’？”这样的宣传“上不合乎国情，下不能安民心”。那位记者心悦诚服地作了检讨，认识到新闻宣传必须实事求是。

周恩来反对使用绝对化的词语，而是留有余地，以免给工作造成被动。1960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稿说：“我国人民向来对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组织，绝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周恩来将后半句改为“是有足够认识的”。1972年2月19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你们新闻报道中说尼克松政府在越南陷于“无法解脱的苦恼”，我改为“难以解脱的苦恼”。前者把话说绝了，不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而且用“无法解脱”也不符合实际，改为“难以解脱”既准确，又没有把话说绝。

尊重受众是周恩来改稿高屋建瓴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媒体由传者为中心改变为受者为中心应该是从周恩来开始的。1973年，周恩来特意在向台湾播发的一篇广播稿的末尾加上“晚安！”两个字，增加后，显得亲切、自然。1971年10月，重排的《新华字典》样稿送领导审阅，周恩来在《节气表》三个字下加了一个括号，括号里写明“按公元月日计算”。原稿没有标明表中的月日是农历或阳历，在当时情况下，是不便于读者查阅的。周恩来的细致、严谨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尊重受众绝不是一味迎合受众，一些媒体刊登诸如荤事荤文荤话荤段子之类“花边新闻”这绝不是创新，而是对读者的误解和亵渎。编辑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切不可小处随便。

书面语和口语的完美结合是周恩来修改稿件创新性的第三个特点。书面语文雅、精致、端方，可简练又传神地状物状人，体现尊贵的大家教养；口语活泼、灵动、变化，可简美质朴地表现审美理想，从枯燥的教条中摆脱出来，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两类语言，又有着各自的危险，前者拘谨，不免失于刻板，染上漠然的表情；后者极易流于俚俗，丢失批评的距离。两者融合得好，取长补短，效果神奇。

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周恩来在修改稿件时既借鉴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也从外国语言中吸收需要的成分。周恩来改稿总是根据需要该口语时则口语，该书面语则书面语。

1945年12月15日，周恩来致函郭沫若，为了使《棠棣之花》一剧更臻完美，他逐字逐句推敲了剧本，从郭沫若是四川人，不熟悉北方常用语，到“你”和“您”字的准确运用，一一提出意见。函曰：“沫兄：剧本读过，我在字句上的斟酌，另纸书上，请考虑。”这个“字句上的斟酌”，竟长达2000余字。1964年9月25日，周恩来对大型歌舞《东方红》朗诵词作了14处修改，比如第二场（之一）把“染红了黄埔滩，珠江口、湘江岸……”改为“染红了黄埔滩头，珠江堤岸、湘江两岸……”一直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汉语四音节结构在音韵上是一个优化组合。周恩来将原稿三音节词改为



1938年夏，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武汉会见美国记者斯诺。

四音节，更具有乐感、美感。

“推敲”的故事流传久远，周恩来改刊名、地名演绎了“现代版的推敲”。他在为《知识就是力量》题写刊名时，对刊名进行的修改同样体现其高超的修改艺术。知识就是力量，是英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培根的一句名言，也是苏联《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的刊名。1956年前，国内一直译作“知识即力量”，因此，请周恩来题写的刊名也是“知识即力量”。可是，周恩来却题写了两种刊名，一种是“知识即力量”，一种是“知识就是力量”。周恩来的秘书附了一封短信，转达周的意见说，刊名如用“知识就是力量”，更为有力，更符

合通俗化的要求。但究竟用哪个要请编辑部自己决定，因此写了两种刊名，供你们选择。周恩来的这个改动使刊名通俗易懂，更加大众化，语意更鲜明，着眼更深远，读起来铿锵有力，更有节奏，更加响亮。

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是周恩来改稿的一贯态度。他在审稿时经常能发现作者、编辑的一些表述和提法信手写来，未加推敲的疏忽错误，从而避免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1962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稿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印度不仅要中国承认它已侵占的大片中国领土是合法的，而且还要中国拱手让出更多的领土，特别是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大片领土。”周恩来审稿时，把后边“特别是……”这句删去了。本来，凡是中国领土都不能拱手让人，这里根本不存在哪一块领土“特别”不能让的问题。写了这个短句，不仅画蛇添足，而且容易引起误解。

发现文稿中甚至连写作高手也极难发现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并恰到好处、不露痕迹地加以修改，这需要有很高的水平。评论是报纸的灵魂，是报纸的声音。1962年10月1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原稿中，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印度军队侵占的地区既不是在1914年英国用红笔一画的那条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也不是在印度1959年出版的地图上那条已经向北移了的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尼赫鲁先生不管这一切，只要印度军队侵占到哪里，哪里就被宣布为印度领土，并声称要把那里的中国军队‘清除掉’。”周恩来不满意这样笼统的不准确的表述，他提笔改写为：“……按照1914年西姆拉会议的非法的秘密换文，这条所谓麦克马洪线的西端起点是东经91度39.7分、北纬27度44.6分处向东延伸的，也就是经过哈东山口、沙留山口向东延伸的。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承认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但是中国军队却从来没有越过这条线。中国军队现在守卫的地区都在这条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北，亦即在哈东山口、沙留山口之线以北，而印度军队侵占的兼则马尼（沙则）、扯果布、扯冬、卡龙、章多地区，也都是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北，亦即在哈东山口、沙留山口之线以北。因此，真正应该‘清除掉’的是印度的入侵军队，而绝不是守卫在自己领土的中国军队。”经过周恩来的修改，针对性更强了，内容更充实了，论证更严密了，文章的说服力与原稿自是大不相

# 林则徐西学思想论略

武回忆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者，他不仅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虎门销烟，指挥了抗英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尊严，而且与清王朝长期奉行的盲目排外、闭关锁国政策不同，以务实的态度和作风开了了解西方情况、学习西方知识，并将之付诸行动的先河。

## 林则徐与“民主”政治

林则徐在广东禁烟，面对西洋的坚甲利兵，不得不作“西夷”背景的了解，因此有《四洲志》之编著。《四洲志》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当时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概况，内容包括地理历史、政治制度、财政经济、军制武备、对外关系、科技文艺、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以及许多新知新闻。这部书对于当时的中国，犹如一股清新的“民主”空气吹进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的堡垒，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为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高扬“民主”大旗制造了舆论。

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该书竟然提到了西洋的议会，特别是英、美、法三国的上下议院，颇有相当篇幅。该书叙述英国上下两院的结构时，谓上院议员多王公贵胄，

周，周恩来大政治家的本色显现无遗。

国际宣传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如果对风云变幻的国际政坛把握不准，就会削弱宣传效果，甚至会给我国的外交工作造成极大的损失。1951年9月，美国策划召开了对日媾和的旧金山会议，把新中国排斥在外。会前，印度、缅甸声明拒绝参加会议；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虽参加会议，但提出自己的对日和约建议。当时，人民日报准备了一篇社论，对印、缅拒绝参加旧金山会议表示欢迎。周恩来在审阅这篇稿子时，加上了一大段话：“对待美英两国政府所提出的破坏国际协定和准备新战争的对日和约草案定稿与美国政府所召开的背弃国际义务而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外的旧金山会议，在反对这样

全院约426人；下院议员来自地方，“由各部落议举殷实老成者充之”，共658人。谈到议院的权力，指出“国王虽有权裁夺，但必由‘巴里满’（Parliament）议允”；国王行事有失，承办官员要交“巴里满”议处。美国是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军国大事，必“西业”会议而后行。西业即今之参议院（Senate），其议员经由选举产生。选举是将选票“暗书弥封存贮公所”，“以推荐最多者为入选”。法国设“占马阿富”（Les Chambres），其制度与英国相近。

《四洲志》讨论英、美、法议会的组织、权力关系、选举等。林则徐介绍这些观念时，相关的名称都是音译，例如上院译为“律好司”，下院译为“甘文好司”，原来就是House of Lords及House of Commons的音译，但均未予转换，不谙原文者，读之有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林则徐似乎对自己的著作并不满意，加上内容需要进一步充实，因之决定敦请魏源作全面性的补充。

然而，魏源的补充并未超越林则徐的《四洲志》，原因是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限制了其个人视野，重点放在了解英人的坚甲利兵，于议会政治甚少措意，大多转抄《四洲志》的内容，没有进一步的发

一个对日和约的国家中，本来可能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参加会议提出自己对日和约建议并为此建议而奋斗；一种是拒绝签订这样一个和约，因此也就拒绝出席会议。前者是苏联等国家所采取的态度，后者是印度、缅甸等国家所采取的态度。这两种态度都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添加了这样一段话，文章的逻辑性更严密了，避免了人们的疑问：拒绝参加会议的你们欢迎，参加会议的你们自然要反对了？

“创新”一词流行和走热，昭示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创新、崇尚创新、呼唤创新。读图时代、音像时代，片面地强调视听感官的刺激感和快感，将同时带来这个民族整体性的精神痛感的衰减、反思能力的衰减。因此，文字仍然有着无法替代的魅力。只是，

比较突出的一点是，魏源提到了议院多数决的原则，“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循同”，感觉其为一种美好制度。

作为“民主”特别是民主政治的具体运作——议会思想进入中国，加快了中国的民主进程，由此，才有了清廷之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不仅深入理论，同时考求实施的技术，至此中国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实行时期。

议会思想于1840年前后进入中国，这无疑推进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当时引进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传统有功名的绅士，如冯桂芬、王韬等；一类是政府官员，如林则徐、魏源等；一类是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如麦都思等。林则徐是最早注意到西方“民主”政治的中国官员。

## 林则徐与“论用兵”

为了准备反侵略战争，对西方军事、科技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便成为林则徐重点关注的内容。从《澳门月报》第四辑“论用兵”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论用兵”收集了广东、福建的一些海战材料，林则徐根据从澳门翻译的书报中对这些海

读者或者说受众越来越挑剔，如果写文章的人不在文字上下工夫，不在修改上下工夫，面对网络，可能就会“主动投降”。在这个创新的年代，编辑只有把创新内化为自觉要求才是应对新形势的最佳方法。

注释：

《周恩来修改稿》：见《党的文献》，1995（6）。

崔奇：《高瞻远瞩 无微不至——回忆周总理对人民日报国际宣传的关怀和指导》，《外交学报》，1999（3）。

参考文献：

1. 《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7年版。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报编辑部）

编校：杨彩霞